

驳“四人邦”的“权力资本论”

——兼批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李少宇 邓寿明

“四人邦”为了在沙滩上建筑他们虚构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杜撰了一个社会主义时期“权力转化为资本”实际上是“有了权力才有资本”的“新规律”，他们在上海组织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进一步把这个“新规律”理论化，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有“权力”利用商品制度，“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伟大革命斗争中，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很有必要对风行一时的“权力资本论”进行彻底清算，弄清它是个什么货色！

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四人邦”的“权力资本论”，是反对马克思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我们要弄清“权力转化为资本”的反动性，就必须历史地分析“四人邦”这个命题的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一物矛盾着的双方，是由事物的同一性决定的。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要使用“转化”这个概念，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才能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权力和资本，在历史上并不都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政治权力要比资本的资格老得多。政治权力从原始社会崩溃，随着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就存在着，它经历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中，虽然也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但这种“洪水期前的资本形态”，它不产生价值的价值，因此，可以说在这两种经济形态的社会里，是不存在资本的，自然就谈不上“权力转化为资本”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和资本虽然同处于一个经济形态的社会里，但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并不是上帝先赋予他们某种政治权力，才去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资本，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占了生产资料，有了资本，才使他们拥有了统治、压迫、剥削工人的政治权力。在这里是资本的扩大和发展要求拥有政治权力来维护、保障资本的利益，根本不存在“权力转化为资本”。至于资本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而不是“权力转化为资本”。他说：“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

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论》第一卷第168页）货币转化为资本，但并非货币就是资本。就象黑人就是黑人，黑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才是奴隶一样，货币也只有在一定关系下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要转化为资本，还必须要有这样两个条件：第一、货币、财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第二、有一大批丧失生产资料，不出买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劳动者。有了这两个条件，资本家拥有的货币，才可以雇佣到工人，买到机器等生产资料，使工人在资本关系下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余额，这样，货币才真正转化为资本了。当然，在现实的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总是离不开欺诈、暴力和掠夺等等的，但从商品货币关系来看，这些是一种外在的条件，而不属于商品货币交换的内在规律。所以，马克思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考察中，是从商品货币交换的纯粹的形态上研究它们“自己的运动”，而不是用那些外在的情况来说明资本的形成和利润的起沉，从而科学地证明了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不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所迷惑。这里，我们丝毫不否认政治权力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是政治权力可以占有资本、扩大资本，保护资本的利益，加速资本的形成，加速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种权力来沉于资本，又和资本合为一体，列宁把它称为“资本权力”。他说：“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的权力”（《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4页）。但是，不管这种政治权力有多大，无论如何它不能产生或转化为资本，创造财富，归根到底，不是有了权力才有资本，而是有了资本才有权力。

那么，是不是象“四人邦”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是“权力转化为资本”，存在着“权力资本”呢？否！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把资本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排出去了，从根本上消灭了“资本权力”，这里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却没有资本。权力和资本根本就不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存在，并不以资本为前提；资本的存在，也不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为前提。这哪里存在什么“权力转化为资本”呢！

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还不够完善，还存在滋生资本主义的空隙和漏洞；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远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一当供应紧张时，资本主义就趁机活跃起来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确有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这些人当中，较多的并不一定拥有很大的权力。例如：社会上那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非法弄取了一定的货币，就去搞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开办黑工厂等，但他们很快就被我们党和人民揭露、取缔了，他们是有资本而没有权力的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存在，不是从“权力转化为资本”，而是马克思说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这里，我们也不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极少数的干部，利用党和人民给他们的权力，去占有货币、财富，去雇佣闲散人口和流动人口，搞地下运输队、地下包工队、地下黑工厂等。这根本不是“四人邦”所说的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收入转化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是暗地里进行的非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就是这些个别现象，也只能说明利用权力可以占有货币、财富，他们的资本，还是从货币、财富转化而来的。这里，权力的确是加速使他们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并不能证明“权力转化为资本”。或“有了权力才有资本”。至于“四人邦”和那些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效劳的帮派骨干，他们确实利用窃取的权力，随意攫取、占有、掠夺国家

和人民的财富，用来满足他们寄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的需要。如果说“转化”，他们是把货币、财富“转化”为消费，“转化”为挥霍、浪费，“转化”为吃喝玩乐。他们一邦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家伙，要他们去经营资本，恐怕还嫌太动脑筋了呢！

一种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反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中，经济是主要的，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政治的这种反作用，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权力资本论”的根据呢？不能。政治权力在一定条件之下，反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反杜林论》第188页）恩格斯在1890年10月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在谈到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曾经提到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国家权力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进程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方向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3页）不过这种情况最终仍然要归结于前两种情况下的一种。从阶级产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同其经济发展的要求发生了根本冲突的时候，又总是要表现为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同代表过时的生产方式的反动阶级之间夺取政治统治的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以反动的政权被推翻而告结束的。

“四人帮”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权力的这种反作用，胡说“政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叫嚷“权力转化为资本”等等，都是离开了“一定条件”，而贩卖“政治决定论”，把政治权力的作用夸大到可以决定经济运动的性质的地步，这就使他们堕入了历史唯心主义泥坑。政治权力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可能决定经济运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动在内）的性质的，经济运动、资本运动总是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运动的。历史上，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都根沉于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对于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来说，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即使除去掠夺、暴力行为及欺骗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假定，一切私有财产都是以其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而且在以后的全部过程中，又假定他们都是依照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行事，那末，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近代资本的生产，要进到资本雇佣劳动制，要变成整个现代资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了，而毫不需要什么掠夺、暴力、国家的或其他政治的干予。”历史上一切重大的政治变革，总是由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而且，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存在，也是根沉于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作用时，总是同时阐明这种政治权力的根沉。马克思在谈到小商品经济发展必然会被资本经济代替时，曾指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

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资本论》1975年版第830页）这种暴力的剥夺是小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通过资本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表现出来的。至于这种剥夺包括的一系列的暴力手段（抢劫、赶杀、买卖黑人等），则是符合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发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的。同样的道理，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剥夺者被剥夺，也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决定的。马克思说：“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资本论》第一卷第831页）可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可是它却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阻碍，只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暴力干涉，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外壳而解放生产力，因此，暴力革命也是经济运动发展的要求。任何政治权力，只能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只能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或者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根本不能起创造或消灭经济（资本）运动内在的客观规律的作用。

“四人帮”还企图用“精神变物质”来为他们那个“权力转化为资本”辩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讲的“精神变物质”是以物质变精神为前提，这同“四人帮”鼓吹的“权力转化为资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哲学上讲的物质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精神则是物质在人们头脑的反映。权力并不是精神。权力主要是指政权的力量，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包括国家机关、军队、监狱、法院等等，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有与此相适应的一定的政治权力，它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政治权力称为“物质力量”，归根到底“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量”（《资本论》第一卷第319页）。资本不用说也是一种经济关系，用“精神变物质”来套，其荒唐之至，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始终都是真理，任何歪曲、篡改、谎言都将被真理粉碎。

杜林“暴力论”的最新变种

“四人帮”鼓吹的“权力转化为资本”，果真如他们一帮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新规律”吗？否。一查《反杜林论》，原来“四人帮”贩卖的“权力资本论”，却是杜林先生那个商店的，被恩格斯早就批过的破烂货。不同的是“四人帮”的“权力资本论”还渗杂了一些现代资产阶级腐朽的货色。

“四人帮”的“权力资本论”，鼓吹“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变资本”、“有权力才有资本”，突出的是一个“权”字，他们把权力说成是万能的，似乎有了权就可以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这实际是林彪“政权决定一切”谬论的继续和发展。林彪、“四人帮”都是权力万能论者，他们同历史上的杜林一样，都是权力拜物教的信徒。

杜林当年就说过：“暴力的产物是资本赢利”，“本沅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寻找”，政治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经济“总是第二等的事实”。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了杜林的衣钵，利用杜林先生的历史唯心主义，企图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症，竭力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他们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把政治权力说成是第一性的因素，把经济说成是第二性的因素。特别是凯恩斯

主义者把国家政权干预经济解释为可以代替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决定经济发展的新的道路的因素；另外，象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则直接宣称资产阶级国家是经济规律的创造者；还有的人，则干脆地说，现在“只是大炮在调节生产、贸易和消费”。美国还有个经济学家米奇尔竟对经济规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说：“当政治和军事的鼓励的，或者非政治和军事鼓励的大量津贴成了人类福利的巨大支柱时，已没有必要絮絮不休地来谈论前些日子的经济规律，因为‘每人多为自己’已经成为常规，而最后的定论全是由魔鬼来掌握。”（《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9页）

总之，他们否认经济运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经过国家权力的调节和种种措施，就可以挽救资本主义，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克服的矛盾，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得到消除。可是，事与愿违。经济总是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运动，国家政权的干预，仍然解决不了周期暴发的经济危机。

杜林、凯恩斯、克拉克、米奇尔以及他们的信徒林彪、“四人邦”鼓吹的“政治决定论”，总是把“政治状态”当作“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把经济当作从属的“第二等的事实”。因此就象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的那样，“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溃，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来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而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气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反杜林论》第163页）“四人邦”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一样，夸大政治权力的作用，挥动权力的魔杖，只能证明他们同杜林一样进入了同样的迷途。他们的彻底破产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转化为资本”实际上是“有权力才有资本”，并非什么“新规律”，而是一些早就被马克思主义批臭了的黑货，“四人邦”重新加以伪装，当作一种“新规律”抛出来，是为贯彻执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自从“四人邦”在辽宁那个死党炮制“权力资本论”后，“四人邦”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在杜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进一步加以鼓吹。并公然宣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说穿了，这个“基本任务”就是为他们反动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有的学报和刊物更是一唱一合，胡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由“资本转化为权力”，再由“权力转化为资本”；而社会主义时期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同样是受这个“资本和权力相互转化规律的支配”。叫嚷“党内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如同资本家手中的资本一样”，甚至享有比资本家更大的支配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权力，这些对“权力资本论”的注解，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邦”的“权力资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公然背叛，是对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放肆污蔑，矛头直指掌握着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它们以极大的尖锐性，让人们看到“权力转化为资本”这个“新规律”，是怎样歪曲、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怎样继承杜林之流的反动思想体系，怎样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进攻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四人邦”这个反动的思想武器。